

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之測量恆等性及發展軌跡

王政傑

臺北市建安國小附設幼兒園教師

聶西平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幼兒與家庭科學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父親在嬰幼兒階段的參與對孩子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影響。本研究旨在探討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測量面向以及發展軌跡。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3 月齡組樣本 3 到 24 個月的父親填答資料，包含父親的背景變項以及父職參與的情形。研究結果顯示，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核心因素為「關愛與回應這孩子」和「陪這孩子玩」，同時該因素在長期調查中具有測量恆等性。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分析顯示，父職參與在 3 到 24 個月期間呈現了穩定的增長趨勢。孩子出生 3 個月時父職參與的程度有較大的個體間差異；而隨孩子成長，原本參與程度較低的父親，後續參與程度增加的速率較快。這顯示父親在進入父職角色後，逐漸發展出父職參與的歷程。本研究探討在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意涵及發展趨勢，強調父親參與育兒的程度和方式會隨著孩子成長而變化。這些發現對於親職教育實務和未來父職研究都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父職參與、因素分析、測量恆等性、潛在成長曲線模式、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Measurement Invariance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

Wang, Cheng-Chieh

Teacher, The Affiliated Kindergarten of Taipei Municipal JianAn Elementary School

Nieh, Hsi-Ping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ld and Family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the infant and early childhoo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child development.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dimensions and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during the infant and toddler period, using data from the 3-month age group of the 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database. The data span the period when the child was between 3 to 24 months old, incorporating variables related to the father's background and their engagement in parenting activitie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fundamental components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during this important developmental phase are centered around "caring and responding to the child" and "engaging in play." Additionally, these aspects demonstrated measurement invariance over time, suggesting their stability across the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Results from th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unveiled a consistent increase in paternal involvement from 3 to 24 months, with notabl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Fathers who were initially less involved tended to increase their engagement at a faster pace as the child aged. This indicates an adaptation and deepening of the father's role in parenting over time. By shedding light on the patterns and significance of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the early years of a child's life,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enhancing parenting education and guiding the parenting and chil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 the future.

Keywords: paternal involvement; factor analysis; measurement invariance;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ing; Kids in Taiwan

壹、緒論

「父職參與」是指父親參與育兒為主的角色與行為（王叢桂，2000）。這一個概念包括了育兒勞務和親子互動等多個面向（利翠珊、陳富美，2004）。隨著社會的演進，父職參與對嬰幼兒發展的重要性日益受到重視（Lamb, 2000）。例如，Brown 等人（2012）的研究發現，早期的父職參與對孩童三歲時的安全依附感有顯著的正向影響。Rempel 等人（2017）亦指出，提升父職參與的程度，可以促進九個月大嬰兒在動作、語言及社會情緒等方面的發展狀態。近年研究也發現，父親在六個月大嬰兒的照顧中有較高的參與度，與孩子在三歲時的大肌肉、精細動作、解決問題及個人社交能力方面發展遲緩的風險較低有關，同時這些相關性有部分是透過減少母親的育兒壓力而間接形成的（Kato et al., 2023）。由此可見在嬰幼兒階段，父親透過親子互動，如陪伴和遊戲等，參與育兒的行為，對嬰幼兒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父職參與會因為社會文化背景的影響，而形塑其意義和內涵（LaRossa & Sinha, 2006）。過去，父親通常被視為母職的輔助者，主要扮演家庭的經濟支柱角色，較少直接參與育兒的工作（Isacco et al., 2010）。然而，隨著社會的變遷，父親在家中扮演的角色也在逐漸轉變。Hawkins 與 Dollahite（1997）指出，現代社會中的父職參與文化鼓勵父親要與家人進行更多的情感交流，並分擔教養子女的責任。在臺灣，隨著社會的全球化和壓縮現代性（藍佩嘉，2014），父親在教養上積極參與的程度亦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毛萬儀、黃迺毓，2010）。

儘管父職參與的文化已經發生改變，但相關的研究仍然十分有限（Lang et al., 2014）。過去有關親職的研究多集中於對母職參與的探究（Hertenstein & Campos, 2004; Stenberg & Hagekull, 1997），導致父職參與在嬰幼兒發展研究中成為一個顯著的知識缺口。同時，關於父職參與的研究也必須面對兩個難以避免的問題；一是父職參與是否可以沿用母職參與同樣的題項去測量，二是父職參與研究跨文化的適切性（Wong et al., 2022）。此外，過去研究對於父職參與的概念及面向也有分歧的看法。因此，不論是在增進親職教育實務上對於父職參與的了解或是在學術研究上對父職參與作進一步討論，以父職參與為主題的研究都是相當重要的。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學者利用縱貫性資料來探討親職參與隨子女生長而產生的變化 (Ferreira et al., 2018; Lang et al., 2014; Simons-Morton & Chen, 2009; Wood & Repetti, 2004)。隨著子女的出生和成長，父親面對不同時期的孩子也逐漸從新生兒的父親、轉換為嬰幼兒的父親、學齡兒童的父親，而在父親的角色上發生相應的轉變。關於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成長趨勢，過去的研究發現呈現出父親在社會化父職角色的歷程。例如，Lang 等人 (2014) 發現在子女出生後的前九個月中，父職參與程度會逐漸增加，而 Ferreira 等人 (2018) 也發現雖然在子女四到七歲之間的母職參與相對維持穩定，但是父職參與卻表現出隨時間而增長的趨勢。這些研究似乎證實了父職參與會隨孩子年齡增加而成長。然而，國內利用縱貫性資料進行父職參與發展的研究相對缺乏，也缺少對於父職參與測量的討論。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父職參與在嬰幼兒時期的發展趨勢，並希望透過縱貫驗證性因素分析來確認在嬰幼兒時期不同時間點間父職參與的測量恆等性。

鑑於國內關於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縱貫性調查相對稀缺，本研究將利用自 2014 年起執行的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張鑑如等人, 2017)，分析嬰幼兒在 3 至 24 個月間父職參與的發展軌跡。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有兩個，第一，是檢定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長期測量恆等性的問題；第二，是估計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長期發展軌跡。透過這項研究，我們期望能夠深入了解臺灣當代父親的父職參與隨著嬰幼兒的成長而發展與變化的情形。

貳、文獻探討

一、父職參與的概念

父職參與，乃至於親職參與，在研究上的挑戰在於名詞定義上的分歧 (Mattingly et al., 2002)。各種名詞的使用充滿異質性，也使得研究結果難以整合 (Rollè et al., 2019)。Lamb 等人 (1985) 提出父職參與的三維架構中，較易測量的面向為「父職投入程度 (paternal engagement)」，該面向以父親在與子女直接互動 (餵食、協助完成作業、遊戲等) 行為所投入的時間多寡作為父職參與積極程度的測量，也是較為後續研究者所採用的定義。但即使如此，捕捉父職參與的概念仍是困難的任務。以餵食為例，該行為或許適用於新生兒子女的父職參與內涵，但是對於測量青少年子女的父職參與則較不適用。再者，對於子女教育方

面的參與，對子女在學時期可能是極重要的父職參與面向，但是當子女成人後這方面的參與任務便消失。換言之，父職參與的概念本身會隨著子女的發展而有所變動，也具有階段性的發展歷程（李淑娟，2009；Palkovitz et al., 2003）。

除了從發展階段來了解父職參與的意涵，「當爸爸」的意義也受到社會脈絡建構的影響（LaRossa & Sinha, 2006）。Molloy 等（2022）將父職參與的文化規範分為「Dad 1.0」與「Dad 2.0」，用來呈現時代變遷下父職參與意涵的轉變。「Dad 1.0」是貫穿上個世紀的舊版父職意象（Isacco et al., 2010），強調父職參與主要是成為母職的協助者、家中的經濟支柱，以及子女行為的管教者（disciplinarian）。「Dad 1.0」強調父職的經濟貢獻，而與家人在情感上則是脫離的，也避免插手對子女，尤其是嬰幼兒時期子女的照顧。一篇過去的研究也發現（Fox et al., 2000），雖然男性也同意需要與伴侶一同分擔子女照顧的責任，但在父職參與的實際行動上卻仍以賺錢為主。「Dad 2.0」的意象則源自於 Hawkins & Dollahite（1997）提出的傳承創新父育模型。比起「Dad 1.0」，新版的「Dad 2.0」鼓勵父親與家人有更多的情感交流、直接參與子女的發展、並分擔照顧及教養的責任。「Dad 2.0」強調與子女相處的時間裡，父親要與子女玩耍、念繪本、照顧子女（例如包尿布、洗澡），並與孩子建立情感的聯結。父職參與的角色變化其實呼應了大時代背景下對親職性別規範的轉變，以及更多婦女參與就業市場的社會經濟脈絡（Yogman & Garfield, 2016）。

而從本土的質性研究也可以發現，父職參與意涵在臺灣社會中所經歷的變遷。華人傳統上有「父不親教」的觀念（王叢桂，2000），傳統父親主要是提供經濟支持，而非直接教養子女，也傾向避免與子女建立情感上的親密。上個世紀末，臺灣學者發現當時的父職參與具有選擇性，父親以工作為優先，只是臨時性的幫忙育兒工作。因此，學者當時直言「新好男人的時代仍未到來」（王舒芸、余漢儀，1997）。隨著臺灣社會經歷全球化及壓縮現代性（藍佩嘉，2014），同時各方專家及大眾媒體喚起父母的教養焦慮（曾凡慈，2019），千禧年後的父母比過去更重視對子女的投資，父親不只更努力地滿足家中經濟需求，也在教養上更積極地投入。因此，近年來社會已經不再將父職視為是母職的補充，而且期待父親也能夠獨立照顧孩子，父親開始扮演提供孩子照顧與指導學習的角色，成為促進嬰幼兒發展的重要教養者（毛萬儀、黃迺毓，2010）。

二、父職參與測量工具

有關父職參與的測量，首先必須討論父職參與「等於」母職參與，還是兩者其實有別？過去研究發現，父親自評父職參與行為與透過母親他評的結果相似（Wical & Dpherty, 2005），且有同等的預測效力（Hernandez & Coley, 2007），似乎對於父職參與調查來說，母親亦是適合的填答者。然而一篇系統性回顧的研究（Wong et al., 2022）發現，過往不區分父職跟母職题目的親職參與量表，其因素結構有時並不一致。Dyer 等人（2013）也發現在子女 10 到 14 歲時的父職參與調查，在父親、母親與子女填答的結果上並不具有測量恆等性，顯示父職參與的意涵可能隨時間產生結構的改變，也可能因填答者不同而有異。過去部分學者認為父親跟母親在親職參與上扮演不同角色，也帶給子女各個發展領域不同的影響。Kerns 等（2015）發現，子女傾向認為母親是遇到挫折時能尋求安慰的避風港（safe haven），而父親則是讓他們能放心探索外面世界的安全基地（secure base）。因此，用以母親為樣本所編製的問卷來測量父職參與可能會有偏誤，而看不見父親對孩子真正的貢獻，因此需要對父職參與進行測量恆等性的檢驗（Adamsons & Buehler, 2007）。本研究認為使用共同量表來測量父職參與跟母職參與有其研究上的目的，只是在分析上需要進一步檢驗其因素結構及測量恆等性，確認量表測量的適切性。

父職參與測量的另外一個議題是關於量表在不同文化情境下的適當性。Wong 等人（2022）回顧過去 84 份測量父職參與的量表工具，發現問卷多以歐美白人父職參與作為編製及測量的目標，細看其中回顧的具跨文化適切性的工具（如 Rohner 於 1990 年發表的家長接納與管教問卷〔Parental Acceptance-Rejection Questionnaire, PARQ〕），也並無在臺灣本土被廣泛驗證的研究紀錄。本研究將以臺灣本土研究所使用，經過信效度驗證後的量表來討論，以符合測量本土文化脈絡下父職參與之需求。

關於父職參與屬於單向度或是多向度的概念，其實並無定論。陳家鳳等人（2016）編製的「新手父母親職參與量表」，編修自 McHale & Huston（1984）的照顧子女工作量表（child-care tasks）。該量表為三點量表，題目包含準備食物、幫小孩洗澡、跟小孩玩等 13 項，得分愈高代表填答者本身親職參與的頻率愈高。第二個單向度量表工具為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所使用的「親職參與量表」（張鑑如等人，2017），該量表適用於測量三個月至六歲間的親職參與，用來測

量父職參與及母職參與的題項相同，題目詢問最近三個月，這孩子父親或母親實際參與「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教這孩子生活常規」、「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關愛與回應這孩子」、以及「陪這孩子玩」的頻率。該量表為四點量表，分數越高表示父職或母職參與程度愈高。量表的內部一致性及再測信度都具有顯著水準（張鑑如，2020a）。該量表在兩次初試及兩次預試之間，皆透過專家諮詢及認知訪談進行效度的檢驗。

此外，其他學者也提出多向度的父職參與測量工具。郭美娟、陳若琳（2012）所編製的「父職參與量表」源自於利翠珊、陳富美（2004）的「親職分工量表」。該量表認為父職參與包含了「育兒勞務」如準備子女的膳食與點心，及「親子教養」如協助子女建立日常生活常規兩個面向。賴金滿、孫海倫（2019）的「親職參與行為量表」將父職參與分為「工具性」、「情感性」及「責任性」三個面向。「工具性行為」為實際承擔子女身體照顧任務（例如：幫孩子泡奶、幫孩子洗澡等），以及家務工作（例如：打掃房間、洗曬衣服），此分量表共九個題目；「情感性行為」為與子女情緒互動交流的陪伴或遊戲行為，包含和孩子一起玩玩具等五題；「責任性行為」為家長覺察孩子社會、情緒、認知、身體發展需求，並予以滿足其所需資源，達到幸福所表現的照顧責任行動，包含帶孩子去戶外等五題。將嬰幼兒階段父職參與分為四個面向的量表則包括蔡銘津、李雅鈴（2015）編製的「幼兒父職參與量表」。此量表分析父職參與內涵與相關研究後，將父職參與區分為「生活照顧」、「關懷溝通」、「休閒活動」、「學校活動」四個面向。張瑋娟等人（2010）編製的「父職參與量表」，則參考過往多份學者所編製之父職參與問卷，並統整相關文獻與內涵，加上研究者自行編擬之題項編製而成。此量表將父職參與分為「日常照顧」、「情感支持」、「子女教養」、「學習活動」等四個面向。

比較上述工具可發現，照顧子女基本需求如飲食、洗澡，多包含於各量表測量的內容之中，其面向名稱為「育兒勞務」、「工具性行為」、「日常照顧」、「生活照顧」等。而雙向度量表中的「親子教養」在三向度時大略被分解成「情感性行為」與「責任性行為」。情感性行為在四向度量表可對應為「情感支持」或「關懷溝通」。責任性行為在四向度量表中又被分解成「學校活動」跟「休閒活動」。對照各量表題目後可發現，當量表擴展至四向度，便會出現更多在子女教養及學校家長參與的題項（例如：「我會幫忙指導孩子的功課」），這個現象符合父職參與角色發展的觀點，也就是父職隨著子女成長，其參與內涵也更為豐富。但學校

活動的部分，在本研究聚焦的零到二歲嬰幼兒父職參與中可能較不重要。

三、父職參與之長期發展

長期來看，父職參與可視做父親角色發展的一個成長及自我實現的歷程，父親透過照顧子女的互動過程中，重新定義自我的價值（Abell & Schwartz, 1999）。Hawkins 與 Dollahite（1997）提出「傳承創新父育（generative fathering）」的發展框架，認為父親透過建構與投入家庭生活，感受到自己有能力創造延續性的影響，因而覺得自己具是「傳承創新（generative）」的貢獻（李淑娟，2009）。受到 Erikson 提出心理社會發展階段的啟發，傳承創新父育的觀點將父職參與視為一個發展性的歷程，每個階段都有其父職角色對應的發展任務（Adamsons et al., 2022）。簡言之，傳承創新父育觀點將父職參與定義為父親在學習成為父親的心理社會發展歷程中，為滿足各該階段子女需求，學習完成其角色任務所做的行為。當子女處於嬰幼兒時期（零到二歲），因為子女面對環境刺激仍相當脆弱且需要被保護，也有較多情感依附的需求，因此父職參與需透過學習父親的角色任務，進而提供子女安全感及持續的照顧（Majeske & Marshall, 2022）。根據傳承創新父育的觀點，每一個階段都在持續學習怎麼做父親者，會隨著子女不同的需求加以調整（李淑娟，2009）。換言之，父職參與之所以具有發展性，是因為父親要不斷面對新的挑戰而發展出新的育兒行為（毛萬儀、黃迺毓，2010）。

Flouri & Buchanan（2003）發現過去父職參與的經驗會持續影響父親育兒的行為，因此認為父職參與的演進是具有連續性的。由於父職參與具有發展性的特質，研究者開始以長期追蹤資料分析父職參與的長期變化。Wood & Repetti（2004）分析父母親在其子女國小四到六年級時親職參與的潛在成長軌跡，發現父職參與在這期間有潛在成長的趨勢。Simons-Morton & Chen（2009）也透過潛在成長模式發現從六到九年級青少年家長的親職參與有潛在緩慢下降的趨勢，而且下降的趨勢與青少年學校投入（school engagement）及問題行為同儕的增加有關聯。Ferreira 等人（2018）調查家中有四到七歲子女的雙薪家庭之親職參與，發現母職參與程度維持穩定，而父職參與程度則會隨時間而增加。而 Lang 等人（2014）研究子女出生後三到九個月的雙薪家庭親職參與發展趨勢，則發現父職參與及母職參與在六個月中都有所增加。從上述研究可發現，當子女在不同的年齡區間、不同發展階段，父職參與的發展趨勢可能會有所不同。國內以嬰幼兒階段為主的父職參與長期追蹤量化研究並不多，也缺乏對與台灣父親參與育兒行為發

展軌跡的討論。因此本研究期待透過分析本土的縱貫資料，探討當代臺灣父親在子女嬰幼兒期間父職參與的發展歷程，並探索父職參與發展趨勢。

綜上所述，本研究聚焦於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發展，探討嬰幼兒時期父親投入育兒行為之變化趨勢。因為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的長期追蹤資料，提供了從嬰幼兒 3 個月至 24 個月父職參與可能包含的面向，且該問卷量表具備一定的信效度，為國內極少數針對嬰幼兒家長編製的長期追蹤資料庫，具有極大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將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嬰幼兒時期的父職參與量表做為資料的來源，進行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發展的探討。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使用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後簡稱 KIT）3 月齡組樣本第 1 波到第 5 波的資料。該樣本第 1 波到第 5 波調查分別在嬰幼兒 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1 歲）、18 個月（1 歲半）及 24 個月（兩歲）的時間進行（張鑑如，2020a，2020b，2021a，2021b，2022）。KIT 抽樣規則採分層兩階段 PPS 抽樣法（stratified two-stage 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sampling），分別以鄉鎮市區及個人做為兩階段的抽樣單位。鄉鎮市區部分係將臺灣本島地區調整合併為 19 個分層單位，考量花東地區人口數過少及人口密度分佈不平均，為了確保取樣能充分代表花東地區，實際執行花東地區樣本抽樣時便不進行鄉鎮市區的抽取，直接以個人為第一抽取單位（張鑑如等人，2017）。

為了解父親自評的父職參與程度，本研究分析之資料為由父親填答之樣本。再者，Choi 等人（2018）發現非婚生子女之未同居生父的父職參與隨子女成長有逐步下降的趨勢。有鑒於其他婚姻狀況父親的父職參與發展軌跡可能與已婚狀況中的父親有所不同，為排除潛在的混淆因素，本研究選取在孩子 3 個月到 24 個月間皆為已婚狀況之樣本進行分析。因本研究以潛在成長趨勢線推估父職參與的發展軌跡，假使五波中父親實際填答僅有一波，則會影響軌跡的估計，因此本研究分析至少完成兩波以上父職參與資料之樣本，而有兩波以上父職參與資料但其中分析變項有遺漏值的樣本，則以最大概似法進行估計。最後符合條件

的樣本數為 291 位。Diallo 等人 (2014) 透過模擬數據建議，一般來說三因子的潛在成長曲線模型 (帶有估計二次斜率者) 樣本數至少要達到 250，但理想的數值是 400，重複測量四次者至少要有 100，但理想上要有 150。本研究父親自填樣本的樣本數為 291 位，符合潛在成長曲線模型檢定力對最低樣本數的要求。

二、研究工具

KIT 的父職參與測量包括「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教這孩子生活常規」、「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關愛與回應這孩子」、「陪這孩子玩」等五題。該量表為四點量表，量尺從 1 到 4，分別代表很少、有時、經常、很經常。該量表的內部一致性 (Cronbach's $\alpha = .92$) 及再測信度 ($r = .80, p < .001$) 均達顯著水準。效度部分，該量表在兩次初試及兩次預試之間，均透過兩階段的專家諮詢及認知訪談修改問卷，具專家效度 (張鑑如，2020a)。

背景變項方面，本研究將父親教育程度變項編碼改以教育年數重新編為「6 = 國小及以下」、「9 = 國 (初) 中」、「12 = 高中 (職)」、「14 = 專科」、「16 = 大學」、「18 = 碩士及以上」。父親工作狀況則使用 3 月齡組第 1 波之資料，將原先選項編碼依工作時數多寡整併為「0 = 全職工作」、「1 = 非全職工作」。家庭所得部分，KIT 詢問受訪者家庭每個月所有收入大約金額，未滿 20 萬元的選項以 1 萬元為級距，20 萬元以上的選項則以 10 萬元為級距。本研究以各選項中間值，並以千元為單位重新編碼，進行後續分析。

三、統計分析

過去 KIT 研究曾將父職參與拆分為「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參與，以及「親子互動」參與兩個面向 (李宇雯、張鑑如，2022)，也有經審視題意後將「教這孩子生活常規」、「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這兩題不適用於 3 個月嬰幼兒之題目刪除的處理原則 (吳亞蓓、聶西平，2021)。再者，根據文獻回顧可知，父職參與可能是多向度的概念，因此本研究先透過對各波次的父職參與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以了解各波次的因素結構。再利用「縱貫驗證性因素分析」(longitudinal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LCFA) 確認選取的因素是否具有縱貫測量的恆等性 (邱皓政，2017)。本研究經主軸因子法、斜交轉軸後，根據平行分析法萃取兩因素，並通過競爭模型選取在各波之間穩定的一階兩因素，進行測量恆等性 (弱恆等) 的檢驗。探索性因素分析使用以 R 語言為

基礎的開源軟體 JASP（版本 0.17.1.0），縱貫驗證性因素分析則使用 *Mplus* 8.6。

本研究第二部分則以潛在成長模式（latent growth modeling, LGM）進行父職參與發展軌跡的分析。本研究使用具成長變動趨勢的二因子 LGM 及三因子 LGM 進行探討。二因子 LGM 包含「截距因子（intercept factor）」與「斜率因子（slope factor）」；三因子 LGM 則包含「截距因子（intercept factor）」與「斜率因子（slope factor）」以及「曲率/二次項因子（quadratic factor）」。以本研究的父職參與三因子模型為例（見圖 1），將截距因子各波因素負荷量設為 1，反映的是本研究所調查之父職參與在五波測量間的起點水準。因為五波資料分別代表 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18 個月及 24 個月的資料，時間間隔不同，因此斜率因子各波因素負荷量設為 0、0.5、1.5、2.5、3.5，反映在這五次測量之間的線性增長趨勢；曲率因子則為斜率因子的平方，反映了測量期間的曲線增長趨勢。潛在成長模式亦是使用 *Mplus* 8.6 進行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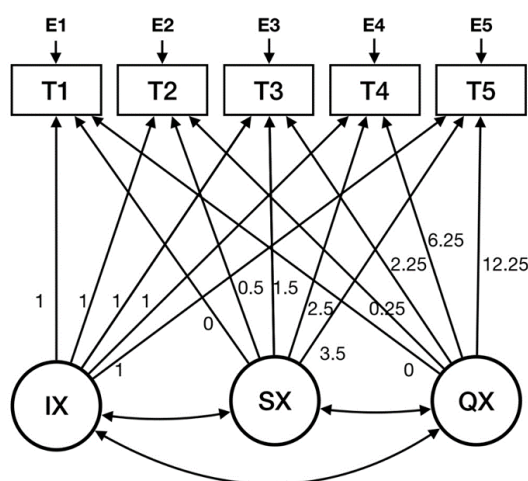


圖 1 三因子 LGM

肆、研究結果

一、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表 1 為研究對象的基本資料。研究對象的平均年齡為 36.14 歲，約 6 成以上填答者的教育程度為大學以上。工作狀況部分，父親多半為全職工作，占 94.2%，其他非全職工作，如家管、全職照顧孩子、待業、失業、退休者占 5.8%。家庭月收入平均約 80,920 元，接近該年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每戶可支配平均月所

得的 82,750 元（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

表 1 研究對象基本資料 ($n=291$)

變項	平均數 (標準差)
年齡	36.14 (6.027)
	次數 (百分比)
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	14 (4.8%)
高中職、專科	96 (33.0%)
大學以上	181 (62.2%)
工作狀況	
全職工作	274 (94.2%)
兼職工作	8 (2.7%)
家管、或全職照顧這孩子	3 (1.0%)
待業、失業、退休或其他	6 (2.1%)
家庭月收入	
未滿 3 萬	10 (3.4%)
3 萬~未滿 6 萬	90 (30.9%)
6 萬~未滿 8 萬	53 (18.2%)
8 萬~未滿 10 萬	64 (22.0%)
10 萬~未滿 17 萬	42 (14.5%)
17 萬以上	12 (4.1%)
其他 (拒答或填答不知道等)	20 (6.9%)
平均數 (標準差)	80,920 (49.78)

註：家庭月收入次數分布參考 105 年行政院主計總處家庭收支調查家庭所得五等分位金額重新整理。

二、各波次父職參與情形

表 2 為研究對象在 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18 個月及 24 個月的父職參與分數分布及相關係數。父職參與情形在五個波次間呈現逐漸增加的趨勢，其平均分數如表 2 所示。各波次父職參與得分皆為負偏態，偏度係數在-1 至-1.32 之間，峰度係數自第 3 波（12 個月）開始連續呈現高狹峰（1.2~1.54）的情形，顯示父職參與在孩子 1 歲至 2 歲之間的分佈較為集中。同時，各波次之間的父職參與皆為顯著正相關（ $r = .35\sim.55, p < .001$ ）。

表 2 各波次的父職參與分數分布及相關係數

	3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18 個月	24 個月
相關係數					
6 個月	.535***		.551	.423	
12 個月	.544***	.551***		.518	
18 個月	.406***	.423***	.518***		
24 個月	.364***	.354***	.444***	.542***	
平均數	3.39	3.45	3.49	3.49	3.56
標準差	.74	.69	.67	.67	.60
偏度	-1.00	-1.04	-1.31	-1.32	-1.26
峰度	.23	.34	1.50	1.54	1.20

*** $p < .001$

三、父職參與的因素分析與測量恆等性結果

本研究進一步以 KMO 值及 Bartlett 球型檢定檢驗資料是否適於探索性因素分析。分析結果顯示，各波 KMO 值依序為 .757、.795、.809、.858、.847，皆大於 .70；Bartlett 球型檢定皆顯著（第 1 波： $\chi^2 = 1051.286$, $df = 10$, $p < .001$ ；第 2 波： $\chi^2 = 894.987$, $df = 10$, $p < .001$ ；第 3 波： $\chi^2 = 1202.930$, $df = 10$, $p < .001$ ；第 4 波： $\chi^2 = 1342.834$, $df = 10$, $p < .001$ ；第 5 波： $\chi^2 = 1150.455$, $df = 10$, $p < .001$ ），因此可進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本研究採平行分析法及抖坡圖決定因素個數，根據圖 2 所示，包含五個題項的 KIT 父職量表，應可萃取二個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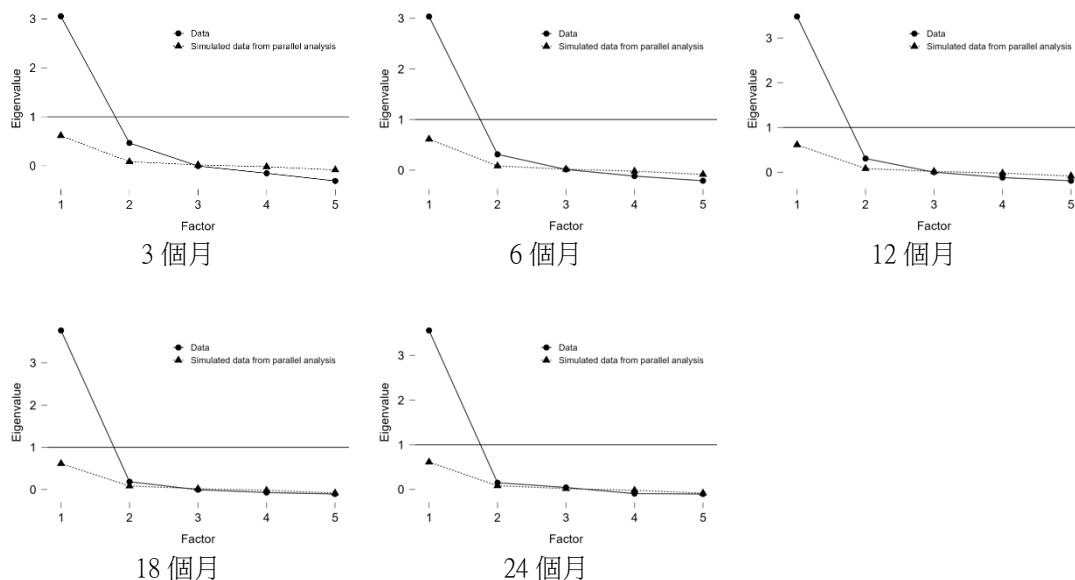


圖 2 第 1 波到第 5 波父職參與陡坡圖

接著以主軸因子法進行估計，並採取 promax 斜交轉軸法，各波次父職參與由二個因素可解釋之總變異量依序為 79.0%、73.9%、81.9%、82.2%、79.5%。表 3 整理了五波資料個別的因素負荷量（僅列出數值高於 0.4 者），萃取的二個因素呼應過往父職參與雙面向之量表之二個潛在面向（郭美娟、陳若琳，2012）。三個月的父職參與共有兩個因素，「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關愛與回應這孩子」、「陪這孩子玩」為一個因素，「教這孩子生活常規」與「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為另一個因素。第 6 個月及 12 個月的因素結構與第一波相同。但在 18 個月因素結構產生改變，「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移至第二個因素。24 個月時出現交叉負荷（「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以及殘差值為負（「教這孩子生活常規」）的情況。接著，本研究使用縱貫驗證性因素分析（LCFA）評估父職參與面向的測量是否具有恆等性。因「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此題在五波因素分析中呈現不穩定的歸類結果，故進一步透過 LCFA 比較「五題為單一因素」、「照顧、關愛、陪玩三題為因素一，教常規、幫學習為因素二」以及「關愛、陪玩為因素一，照顧、教常規、幫學習為因素二」三種因素結構估計跨波次的測量恆等性（形貌恆等）。

表 3 各波次父職參與之因素負荷量

	3 個月			6 個月			12 個月			18 個月			24 個月		
	因素 1	因素 2	殘差	因素 1	因素 2	殘差	因素 1	因素 2	殘差	因素 1	因素 2	殘差	因素 1	因素 2	殘差
照顧這孩子的衣食等生活基本需求	0.65		0.45	0.59		0.42	0.63		0.31	0.60		0.30	0.45		0.40
教這孩子生活常規		0.96	0.16		0.97	0.22		0.99	0.13		0.87	0.19		1.11	-0.07
幫助這孩子的學習活動		0.82	0.22		0.62	0.32		0.78	0.17		0.92	0.08	0.42	0.47	0.25
關愛與回應這孩子	1.30		0.09	1.00		0.22	1.05		0.05	0.84		0.19	0.89		0.28
陪這孩子玩	0.89		0.15	0.93		0.19	0.83		0.25	0.86		0.13	0.88		0.17

註：本分析使用 promax 斜交轉軸法。

表 4 為 LCFA 競爭模型適配度摘要。分析結果顯示，第二個模型的殘差共變異數矩陣（theta）出現非正定解，故將此模型排除討論。比較「五題為單一因素」以及「關愛、陪玩為因素一；照顧、教常規、幫學習為因素二」之結果，後者之 BIC、ABIC 等數值皆較小，CFI、TLI 等數值後者則較大。另外，前者卡方值為

932.875，自由度為 215，後者卡方值為 526.633，自由度為 180，卡方差異檢定結果($\Delta\chi^2 = 406.242, df = 35, p < .001$)為顯著，表示「關愛、陪玩為因素一；照顧、教常規、幫學習為因素二」之跨波次模型較優於其他模型。

表 4 LCFA 競爭模型適配度摘要

	BIC	ABIC	CFI	TLI	χ^2	df	p
模型一：五題為單一因素	11940.235	11512.123	0.893	0.815	932.875	$\frac{2}{15}$	<.001
模型二：照顧、關愛、陪玩三題為因素一；教常規、幫學習為因素二	11611.254	11072.149	0.966	0.944	405.328	$\frac{1}{80}$	<.001
模型三：關愛、陪玩為因素一；照顧、教常規、幫學習為因素二	11732.560	11193.455	0.948	0.914	526.633	$\frac{1}{80}$	<.001

確認較佳的因素結構模型後，接著進行「關愛、陪玩為因素一；照顧、教常規、幫學習為因素二」模型因素恆等性的檢驗。本研究比較各波次測量結構恆等的形貌恆等模型與各波次因素負荷量亦恆等的弱恆等模型。LCFA 因素恆等性檢驗結果如表 5 所示。卡方差異檢定結果($\Delta\chi^2 = 42.044, df = 12, p < .001$)為顯著。但從弱恆等模型之 BIC 值小於形貌恆等模型之 BIC 值，且 ΔCFI 小於 0.1 的判斷標準（邱皓政，2017），可判定弱恆等模型為穩定適配之模型，接受弱恆等模型為較佳模型的結果。

表 5 LCFA 因素恆等性檢驗結果

	BIC	ABIC	CFI	ΔCFI	TLI	χ^2	df	p 值
形貌恆等模型	11732.560	11193.455	0.948	-	0.914	526.633	180	<.001
弱恆等模型	11706.723	11205.673	0.944	-0.004	0.912	568.877	192	<.001

四、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發展軌跡

根據因素分析及測量恆等性的分析結果，本研究使用「關愛與回應這孩子」及「陪這孩子玩」兩題作為嬰幼兒時期的父職參與的「核心因素」，並將兩題得分之平均做為父職參與之分數，進行潛在成長曲線模型之分析。首先，本研究檢驗潛在成長直線模式（二因子模型）。該五波資料殘差變異依序分別為.237、.219、.203、.229、.139，皆無負值且均達統計顯著（ $p < .001$ ），符合基本模式適配的標準。在整體適配度部分，卡方考驗未達顯著水準（ $\chi^2 = 9.501, df = 10, p = .4853$ ），虛無假設成立，表示直線成長模式與資料適配理想。進一步參

考比較配合度指數 $CFI = 1$ ，增值配合度指數 $TLI = 1$ ，皆大於.90，且 $RMSEA < .001$ ，標準化殘差均方根 $SRMR = .058$ ，兩者均小於.08。根據邱皓政（2017）整理之常見 SEM 適配指標，結果顯示整體適配度雖理想，但樣本數對此模型而言可能較少。二因子模型的截距平均數為 3.409 ($p < .001$)，斜率平均數為 0.042 ($p < .001$)，截距因子與斜率因子之相關達顯著負相關 ($r = -0.588, p < .001$)，顯示三個月時的父職參與和後續成長率的趨緩有顯著關聯。另外，由隨機效果可知，父職參與的截距變異為 0.318 ($p < .001$)，斜率變異為 0.019 ($p < .001$)，兩者皆達到顯著，顯示無論是在三個月或是 3 到 24 個月期間的成長速率，父職參與皆存在個體間的差異（如表 6）。孩子出生三個月時父職參與的程度有較大的個體間差異，隨孩子成長，原本參與程度較低的父親，後續父職參與程度增加的速率較快，因此到 2 歲時父親間的父職參與差異會較小。

表 6 父職參與二因子 LGM 的參數估計結果

	估計值	標準誤	<i>t</i> 值	<i>p</i>
固定效果				
截距平均數	3.409	0.039	88.421	< .001
斜率平均數	0.042	0.012	3.516	< .001
隨機效果				
截距變異	0.318	0.036	8.709	< .001
斜率變異	0.019	0.004	4.728	< .001
殘差變異 (3 個月)	0.237	0.029	8.166	< .001
殘差變異 (6 個月)	0.219	0.025	8.889	< .001
殘差變異 (12 個月)	0.203	0.021	9.797	< .001
殘差變異 (18 個月)	0.229	0.023	10.039	< .001
殘差變異 (24 個月)	0.139	0.024	5.799	< .001
共變與相關				
截距與斜率共變數	-0.045	0.010	-4.660	< .001
截距與斜率相關值	-0.588	0.064	-9.139	< .001

根據潛在成長曲線模型估計之結果，可以得到潛在成長曲線模型估計軌跡，如圖 3 所示。圖 3 中的黑點為實際的資料分布，灰線為個人父職參與估計之發展軌跡，紅線則為整體平均估計之發展軌跡。在三個月時的父職參與得分分布比較分散，到了 24 個月時，分布逐漸往上方集中。個體間的得分在各波次間都有顯著的差異，但整體而言，有逐漸向上集中的趨勢。由紅線可知，平均而言父親的父職參與在孩子 3 到 24 個月之間呈現微幅增加的趨勢，但是由個人父職參與估計之發展軌跡也可以看到個人間有顯著的差異，而在起始點參與較低的父親，後續參與程度增加的幅度反而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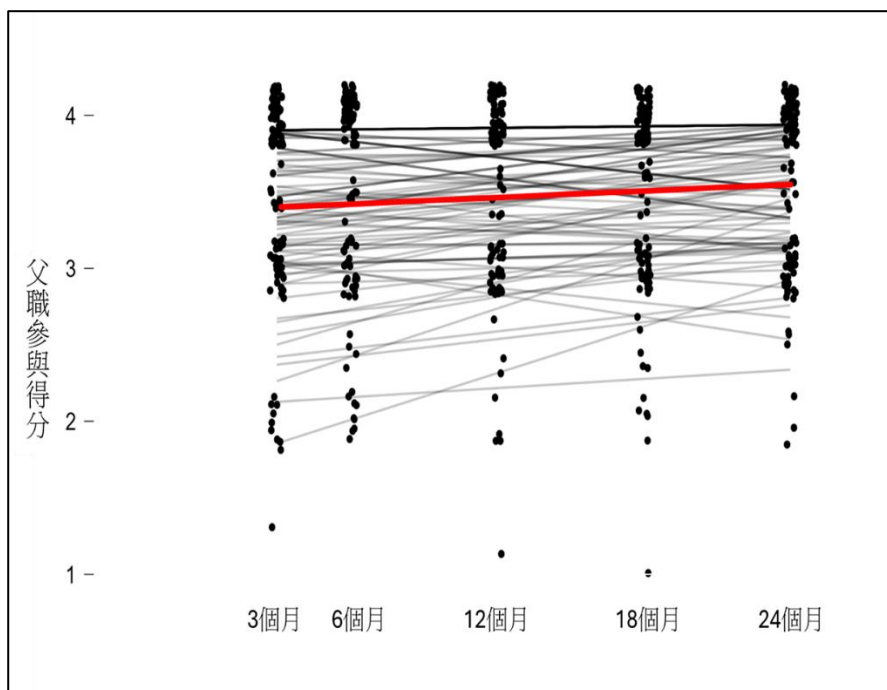


圖 3 潛在成長曲線模型估計軌跡

本研究進一步檢定父職參與的三因子曲線變化趨勢。結果發現父職參與潛在成長曲線模型的曲率因子平均值估計為 -0.004 ($p = .693$)，未達統計顯著。表示在嬰幼兒 3 個月到 24 個月間的父職參與沒有曲線的變化趨勢。最後，在模型中加入父親教育程度、父親工作狀況及家庭月收入等背景變項，來檢定其對父職參與潛在成長模型的影響。父親教育程度、父親工作狀況及家庭月收入對截距影響之參數估計值分別為 0.25 ($p = .159$)、 0.023 ($p = .775$)、以及 $<.001$ ($p = .809$)；父親教育程度、父親工作狀況及家庭月收入對斜率影響之參數估計值分別為 $.001$ ($p = .857$)、 0.037 ($p = .137$)、以及 $<.001$ ($p = .784$)，表示父親教育程度、父親工作狀況及家庭月收入對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發展軌跡之截距與斜率皆無顯著影響。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以臺灣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 (KIT) 的 3 月齡組樣本 3 個月、6 個月、12 個月、18 個月及 24 個月父親填答之父職參與資料進行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之測量面向以及發展軌跡之探討。首先，本研究發現父職參與包含不同的面向。對 3 到 24 個月嬰幼兒的父親而言，父職參與的概念更在於強調「關愛與回應這孩子」及「陪這孩子玩」的「核心因素」，這也呼應賴金滿、孫海倫 (2019) 提到父職參與具有「情感性」的面向，蔡銘津、李雅鈴 (2015) 問卷中的「關懷溝通」，以及張瑋娟等 (2010) 提到的「情感支持」面向。

雖然 KIT 的父職參與量表屬於單一面向的量表設計，但是經過本研究的因素分析及測量恆等性檢定後，可以發現嬰幼兒時期的父職參與較偏向關愛、回應與陪伴。過去利用 KIT 資料進行的研究也曾將父職參與拆分為「育兒勞務及生活規範」參與，以及「親子互動」參與兩個面向 (李宇雯、張鑑如, 2022)，或是根據研究目的，篩選符合的題項進行分析 (吳亞蓓、聶西平, 2021)。本研究使用的父職參與之題項是參考 Wong 等人 (2022) 之建議，透過確認因素結構及測量恆等性等刪題程序後的結果，故能避免過去研究中無法確認估計的因素是否在各波次之間恆等的疑慮。透過縱貫性因素分析，也就是將題項拆解成不同因素，並確認拆解後的因素結構具備多個時點的弱恆等性，也可解決 Dyer 等人 (2013) 提出的測量不恆等問題。本研究提供使用 KIT 資料進行親職參與研究的分析參考，未來在進行父職參與抑或是親職參與的長期研究時，須注意資料量表題項的適切性，並考量親職參與本身的發展與變化趨勢。

過去文獻強調父職參與是一個發展性的過程，其中父親在不同階段重新定義自己的角色，以滿足孩子的需求。父職發展的過程不僅表現在父親與孩子的互動上，也呈現出父親自我實現的歷程 (Abell & Schwartz, 1999)。Hawkins 與 Dollahite (1997) 提出的傳承創新父育框架，認為父職參與有助於父親感受到自己在家庭生活中能夠創造出長久的影響。本研究的發現支持過去文獻觀點，顯示嬰幼兒時期的父職參與有顯著的直線成長趨勢，這與 Lang 等人 (2014) 的發現相符，即父職參與在孩子的早期發展階段呈現增加的趨勢。這樣的發現不僅證實了父職參與的發展性質，也顯示了嬰幼兒出生後兩年間父親經歷了一段適應和成長的歷程。此外，本研究結果所呈現出父職參與的連續性與 Flouri & Buchanan (2003) 的研究相呼應，該研究發現過去的父職參與經驗會持續影響父親的育兒

行為，表示父職參與不僅是對當下孩子需求的反應，同時也是父親本身經驗和行為累積的結果。

父職參與有其獨特的發展歷程，在子女出生後，父職能投入的心力隨時間經驗的累積逐漸提升。另外，潛在成長曲線模型估計的隨機效果也顯示，嬰幼兒時期的父職參與發展軌跡存在個體間的差異。隨著孩子的成長，那些最初參與程度較低的父親往往會經歷更快的參與程度的增加。因此，在孩子兩歲時，不同父親之間在育兒參與上的差異有所縮小。這個發現顯示了父親在育兒角色適應過程中的動態變化，以及父職參與隨著孩子成長的彈性和可塑性。Cabrera & Volling（2019）認為父職研究可以從人類發展以及生態系統的角度（developmental ecological system approach）來了解父職的轉變。父親個人對育兒態度的變化、父親與孩子關係的變化、以及社會經濟因素對父職產生的影響，都反應了父職參與的發展性。過去研究證實父親與孩子的互動方式直接影響孩子的發展（Brown et al., 2012; Kato et al., 2023; Rempel et al., 2017），本研究發現隨著孩子的成長，父親的育兒參與程度會適應孩子不斷變化的發展需求而增加。由此可見，父親和孩子間存在不斷演變且相互影響的關係網絡，這些關係隨著時間和空間而變化。因此透過長期研究觀察父職參與的發展，更能理解父職參與隨家庭互動情形和社會環境影響而變化的動態過程，以及父職對孩子不同生命階段發展的影響。

過去文獻指出，相較於母職參與，父職參與更容易受到結構性因素（如，子女數及社會經濟狀況）的影響（NICHD Early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0）。然而，本研究未發現父親教育程度、父親工作狀況及家庭月收入對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發展軌跡的影響。過去研究發現教育程度較高的父親，其親職參與程度較高（Flouri & Buchanan, 2003; McKee et al., 2021）；全職工作的父親則普遍認為工作間以及職家的衝突，是個人參與親職的主要障礙之一（Diniz et al., 2021），也因此研究發現兼職工作或已退休的父親親職參與較多（Flouri & Buchanan, 2003）。此外，過去研究在家庭所得對父職參與的影響較無一致的結果。McKee 等人（2021）的研究結果認為家庭所得較高的家庭，父職參與會比較多，但 Flouri & Buchanan（2003）的研究結果則認為家庭所得對父職參與沒有影響。家庭所得反映了家務工作的分配以及父親及母親雙方工作的狀態，因此這些因素可能影響了家庭所得與父職參與的關聯性。雖然教育、工作、收入與親職參與的資源有關（Palkovitz & Hull, 2018），然而本研究未發現這些因素與父職參與發展的關聯性。是否這些面向對台灣父親父職參與的影響與過去文獻不同，抑或是受到本研

究的研究對象多為高教育程度全職工作者的特質影響，還待未來研究進一步調查。

本研究的測量工具使用 KIT 父親自陳問卷，因此在自覺參與程度上可能有其主觀認定的成分。未來研究可以分析比較自陳父職參與、子女陳述父職參與、以及配偶陳述父職參與的差異，以期從家庭脈絡中對父職參與有更完整的了解。此外，本研究的父職參與計算是將 3 個月到 24 個月父職參與資料經過因素萃取後的結果，因此本研究的父職參與計算後的平均數無法與其他使用同樣問卷的研究互相比較，但是本研究所採用的分析步驟可以供未來關於親職參與的研究想要針對親職參與的面向作更進一步探討時的參考。本研究從測量「量變」的角度探討嬰幼兒時期父職參與的變化，近年來學界呼籲應該對父職參與的品質進行探討 (Cabrera, 2020; Wong et al., 2022)。本研究結果討論父職參與程度的增加（做得多不多），對於父職參與的品質高低（做得好不好、熟不熟練、孩子感受如何）則是本研究無法回答的問題，尚待後續研究者修訂量表或使用不同的研究設計，對父職參與品質進行更深入的探究。最後，本研究初步檢定父親背景變項與家庭收入對父職參與發展軌跡的影響，然而，過去研究認為影響父職參與的因素亦包含家庭環境、子女特質、母親特質、以及共親職等多重面向 (Flouri & Buchanan, 2003)。未來研究可以再進一步針對父親個人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進行探討。

近年來，父職參與在嬰幼兒發展領域的研究逐漸受到重視。父親在早期階段的積極參與對嬰幼兒發展具有重要影響，嬰幼兒時期的父職參與對孩子後續的認知、社會情緒及身體動作能力都具有長期的效果 (Brown et al., 2012; Kato et al., 2023; Rempel et al., 2017)。本研究發現生命早期的父職參與存在個體發展的趨勢，顯示父親學習適應父職參與的獨特歷程。研究結果凸顯了父親在孩子早期發展中的重要性，以及他們參與方式和程度隨時間的變化。這些發現對於理解父職參與的內涵，以及父職參與如何隨著孩子成長而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因此，未來在親職教育（共親職）、家事商談以及幼兒教養相關的工作坊或講座中，應更加重視父職參與的獨特貢獻，以及父職參與程度的成長潛力。未來的研究亦可以進一步探討父親參與的具體行為如何影響嬰幼兒的各個發展領域，並且考慮家庭環境的多樣性對父職參與的影響，以更全面地理解父職參與在不同社會背景下的內涵及發展。

參考文獻

- 毛萬儀、黃迺毓（2010）。初任父親第一年父職經驗歷程之研究—以六位大專教育程度父親為例。《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12，31-53。
- 王舒芸、余漢儀（1997）。奶爸難為—雙薪家庭之父職角色初探。《婦女與兩性學刊》，8，115-149。
- 王叢桂（2000）。促進參與父職因素的探討。《應用心理研究》，6，131-171。
- 行政院主計總處（2017）。105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 利翠珊、陳富美（2004）。配偶親職角色的支持與分工對夫妻恩情的影。《本土心理學研究》，21，49-83。
- 吳亞蓓、聶西平（2021）。新生兒父母申請育嬰假與其背景因素及親職參與關聯性之研究：育兒的性別差異。《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22，1-22。
- 李宇雯、張鑑如（2022）。雙親家庭親職參與及家庭社會經濟背景與幼兒語言發展關聯之研究。《當代教育研究季刊》，30（2），167-205。
- 李淑娟（2009）。父職的發展歷程—從長子女青少年期到成年中期之三階段分析。《生活科學學報》，13，29-54。
- 邱皓政（2017）。多層次模式與縱貫資料分析：Mplus 8 解析應用。五南。
- 張瑋娟、蔣姿儀、林季宜（2010）。弱勢與非弱勢家庭學齡前幼兒的父親背景及其父職參與之研究。《幼兒教育年刊》，21，195-222。
- 張鑑如、謝淑惠、周麗端、廖鳳瑞（2017）。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簡介。《中國統計學報》，55（1），42-62。
- 張鑑如（2020a）。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3月齡組第一波3月齡（D00180）〔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180-1
- 張鑑如（2020b）。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3月齡組第二波6月齡（D00181）〔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181-1
- 張鑑如（2021a）。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3月齡組第三波12月齡（D00214）〔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214-2

- 張鑑如 (2021b)。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3 月齡組第四波 18 月齡 (D00215) [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215-1
- 張鑑如(2022)。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3 月齡組第五波 24 月齡(D00228) [原始數據]。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https://doi.org/10.6141/TW-SRDA-D00228-1
- 郭美娟、陳若琳 (2012)。雙薪家庭幼兒父親的親職效能、母親的教養鼓勵與父職參與之相關研究。《家庭教育與諮商學刊》，13，57-79。
- 陳家鳳、林惠雅、蕭英玲 (2016)。當第一個孩子來報到：新手父母的親職參與和婚姻滿意度。《中華輔導與諮商學報》，47，91-111。
- 曾凡慈 (2019)。協商 [發展律令]：早期童年的育兒實作與親職治理。《臺灣社會學》，37，47-96。
- 蔡銘津、李雅鈴 (2015)。核心家庭之父職參與和幼兒的社會行為發展及其學習態度關係之研究。《人文社會電子學報》，10 (2)，66-83。
- 賴金滿、孫海倫 (2019)。育有接受早期療育早產兒之父母對偶親職參與之研究。《若瑟醫護雜誌》，13 (1)，7-22。
- 藍佩嘉 (2014)。做父母，做階級：親職敘事，教養實作與階級不平等。《台灣社會學》，27，97-140。
- Abell, S., & Schwartz, D. (1999). Fatherhood as a growth experience: Expanding humanistic theories of paternity. *The Humanistic Psychologist*, 27(2), 221-241.
- Adamsons, K., & Buehler, C. (2007). Mothering versus fathering versus parenting: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in parenting measures.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7(3), 271-303.
- Adamsons, K., Cutler, L., & Palkovitz, R. (2022). Theorizing father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S. Molloy, P. Azzam & A. Isacco (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fatherhood* (pp. 1-27). Springer.
- Brown, G. L., Mangelsdorf, S. C., & Neff, C. (2012). Father involvement, paternal sensitivity, and father-child attachment security in the first 3 year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6(3), 421-430.

- Cabrera, N. J., & Volling, B. L. (2019). Advancing research and measurement on fathering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VIII. Moving research on fathering and children's development forward: Prioriti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future. *Monographs of the Society for Research in Child Development, 84*, 107-146.
- Cabrera, N. J. (2020). Father involvement, father-child relationship, and attachment in the early years.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22*(1), 134–138.
- Choi, J.-K., Kim, M., & Kunz, G. M. (2018). Longitudin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unmarried fathers' involvement and their children's behavior problems: Using latent growth modeling. *Children and Youth Services Review, 91*, 424-430.
- Diallo, T. M., Morin, A. J., & Parker, P. D. (2014). Statistical power of latent growth curve models to detect quadratic growth. *Behavior Research Methods, 46*, 357-371.
- Diniz, E., Brandao, T., Monteiro, L., & Verissimo, M. (2021). Father involvement during early childhood: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3*(1), 77-99.
- Dyer, W. J., Day, R. D., & Harper, J. M. (2013). Wrestling Proteus: Assessing the varying nature of father involvement across contex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5*(4), 837-857.
- Ferreira, T., Cadima, J., Matias, M., Vieira, J. M., Leal, T., Verschueren, K., & Matos, P. M. (2018). Trajectories of parental engagement in early childhood among dual-earner families: Effects on child self-control.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4*(4), 731-743.
- Flouri, E., & Buchanan, A. (2003). What predicts fathers' involvement with their children? A prospective study of intact families.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32*, 81-98.
- Hawkins, A. J., & Dollahite, D. C. (1997). *Generative fathering: Beyond deficit perspectives* (Vol. 3). Sage.
- Hernandez, D. C., & Coley, R. L. (2007). Measuring father involvement within low-income families: Who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reporter? *Parenting: Science and Practice, 7*(1), 69-97.

- Hertenstein, M. J., & Campos, J. J. (2004). The retention effects of an adult's emotional displays on infant behavior. *Child Development, 75*(2), 595-613.
- Isacco, A., Garfield, C. F., & Rogers, T. E. (2010). Correlates of coparental support among married and nonmarried fathers.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y, 11*(4), 262-278.
- Kato, T., Fujii, M., Kanatani, K., Niwa, F., Hirabayashi, K., Nakayama, T., Itakura, S., Kamijima, M., Yamazaki, S., Ohya, Y., Kishi, R., Yaegashi, N., Hashimoto, K., Mori, C., Ito, S., Yamagata, Z., Inadera, H., Nakayama, T., Iso, H., ..., Japan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Study. (2023). Paternal involvement in infant care and developmental milestone outcomes at age 3 years: The Japan Environment and Children's Study (JECS). *Pediatric Research, 95*(3), 785-791.
- Kerns, K. A., Mathews, B. L., Koehn, A. J., Williams, C. T., & Siener-Ciesla, S. (2015). Assessing both safe haven and secure base support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Attachment & Human Development, 17*(4), 337-353.
- Lamb, M. E. (2000). The history of research on father involvement: An overview.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29*(2-3), 23-42.
- Lamb, M. E., Pleck, J. H., Charnov, E. L., & Levine, J. A. (1985). Paternal behavior in humans. *American Zoologist, 25*, 883-894.
- Lang, S. N., Schoppe-Sullivan, S. J., Kotila, L. E., Feng, X., Kamp Dush, C. M., & Johnson, S. C. (2014). Relations between fathers' and mothers' infant engagement patterns in dual-earner families and toddler competence.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35*(8), 1107-1127.
- LaRossa, R., & Sinha, C. B. (2006). Constructing the transition to parenthood. *Sociological Inquiry, 76*(4), 433-457.
- Fox, G. L., Bruce, C., & Combs-Orme, T. (2000). Parenting expectations and concerns of fathers and mothers of newborn infants. *Family Relations, 49*(2), 123-131.
- McKee, K., Cabrera, N., Alonso, A., Turcios, M., & Reich, S. (2021). Determinants of fathers' and mothers' involvement in a parenting intervention. *Psychology of Men & Masculinities, 22*(3), 521-537.

- Majeske, A. J., & Marshall, M. (2022). Fathering adult children and grandfathering. In S. Molloy, P. Azzam, & A. Isacco (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fatherhood* (pp. 135-150). Springer.
- Mattingly, D. J., Prislin, R., McKenzie, T. L., Rodriguez, J. L., & Kayzar, B. (2002). Evaluating evaluations: The case of parent involvement programs.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2(4), 549-576.
- McHale, S. M., & Huston, T. L. (1984). Men and women as parents: Sex role orientations, employment, and parental roles with infants. *Child Development*, 1349-1361.
- Molloy, S., Cole, B. P., Dye, A., Singley, D. B., & Ingram, P. B. (2022). Transition to Fatherhood. In S. Molloy, P. Azzam, & A. Isacco (Eds.), *Handbook of the psychology of fatherhood* (pp. 73-85). Springer.
- NICHD Early Care Research Network. (2000).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athers' caregiving activities and sensitivity with young children.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4, 200-219.
- Palkovitz, R., Marks, L. D., Appleby, D. W., & Holmes, E. K. (2003). Parenting and adult development: Contexts, processes, and produ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s. In L. Kuczynski (Ed.), *The Handbook of dynamics in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pp. 307-323). Sage.
- Palkovitz, R., & Hull, J. (2018). Toward a resource theory of fathering. *Journal of Family Theory & Review*, 10(1), 181-198.
- Rempel, L. A., Rempel, J. K., Khuc, T. N., & Vui, L. T. (2017). Influence of father-infant relationship on infant development: A father-involvement intervention in Vietnam.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53(10), 1844-1858.
- Rollè, L., Gullotta, G., Trombetta, T., Curti, L., Gerino, E., Brustia, P., & Caldarera, A. M. (2019). Father involvement and cognitive development in early and middle childhood: A systematic review.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2405.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19.02405>
- Simons-Morton, B., & Chen, R. (2009). Peer and parent influences on school engagement among early adolescents. *Youth & Society*, 41(1), 3-25.
- Stenberg, G., & Hagekull, B. (1997). Social referencing and mood modification in 1-

- year-olds. *Infant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20(2), 209-217.
- Wical, K. A., & Doherty, W. J. (2005). How reliable are fathers' reports of involvement with their children? A methodological report. *Fathering: A Journal of Theory, Research & Practice about Men as Fathers*, 3(1), 81-91.
- Wong, T. K., Konishi, C., Vargas-Madriz, L. F., & Kong, X. (2022). Survey measures on paternal parenting: A systematic review. *Marriage & Family Review*, 58(8), 748-780.
- Wood, J. J., & Repetti, R. L. (2004). What gets dad involved?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ange in parental child caregiving involvement.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18(1), 237-249.
- Yogman, M., Garfield, C. F., Committee on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Child and Family Health, Bauer, N. S., Gambon, T. B., Lavin, A., Lemmon, K. M., Mattson, G., Rafferty, J. R., & Wissow, L. S., (2016). Fathers' roles in the care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children: The role of pediatricians. *Pediatrics*, 138(1), e20161128.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6-1128>